

# 第一篇 選擇

20世紀80年代初期，一個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組合悄然問世，它那麼奇特，在外人眼裡充滿神奇。這個研究組合，它成立時，沒有任何正式批准手續，沒有編制，沒有專職人員，沒有日常經費，沒有科研津貼，甚至沒有辦公地點。它在北京大學召開成立會時，兩位高層重要人物——鄧力群、杜潤生到會作了長篇講話。很快，這個研究組的調查報告和研究成果，就受到中央領導人的讚賞和重視，並對當時的農村改革和發展的高層決策發生了重要影響，其主要成員，直接參與了中共中央80年代前五個「一號文件」的調研、討論和起草工作。

一群自願者，按照自己的選擇，組合在一起，投入全部業餘、課餘時間去研究中國農村的發展與改革，他們的研究成果，在那個特定的階段，持續對高層決策發揮重要影響，也可以說這個組合頗有深度地參與了高層決策，這絕對是一個奇蹟。在共和國的歷史上，此前沒有，此後也不多見。

這個組合自定的名稱叫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後來得到了公認。筆者有幸從這個研究組正式成立的第一天，就參與其間，願將這段彌足珍貴的經歷，按親歷、親見、親聞的方式，不求全面，但求真實，介紹給讀者。鑒於時間已過去20多年，一些回憶可能失真，一些看法可能變味，所幸白紙黑字，當年的筆記、印刷的文字保存下來了。取捨受偏好、學識、判斷力所限，那是沒有辦法的事。過程描述及對某些人

和事的看法，由筆者負責。所寫之事實如有偏頗，唯請有關當事人更正。

## 橫空出世的「異類」

這個研究組的早期成員，是當代中國的第一批自願者。這個組的形成，是一個典型的自組織過程。同樣不可否認，在這群自願者背後，在它的自組織過程中，一開始就得到了「上層人士」的有力支持，而這個研究組正式成立不到一年，就得到了中國最高決策機構——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高度評價和認可。同一歷史時期，有更多為中國命運奔波的「自願者」，有為數眾多、目標五花八門，通過「自組織」形成的社會團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曾任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副組長的何維凌說過：在中國這樣一個對自組織行為防範甚嚴的國家，能產生發展組，它能存在、能發展，並產生如此大的作用和影響，真是一個「異數」。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始作俑者是陳一諮。當時，陳一諮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人民公社室的助理研究員。1980年初夏，在安徽農村搞了近三個月調查的陳一諮，風塵僕僕回到北京，他異常興奮，沒日沒夜的整理調查材料，趕寫調查報告，一邊盡可能參加各種討論會，旗幟鮮明地支持「大包乾」，支持「包產到戶」；一邊聚會友人，大談農村調查的收穫和體會。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他心中一個固守多年的夙願再次萌動：搞一個綜合性的研究機構，從農村開始，研究中國的發展與變革。他的原始形態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友人們的呼應與贊同。陳一諮又將這一想法向時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辦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鄧力群作了彙報，正面對著有數不清問題急待去研究的鄧力群，立即予以首肯。

陳一諮是典型的「工作狂」，一旦決定了要做的事，他就

會全力以赴，讓他的同仁們忙得團團轉。幾個月時間，他串聯了一大群人，讓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心甘情願地放棄了自己不同的事業和追求，投身其間。很快，陳一諮「文革」期間受迫害補發的工資，就在若干聚會中灰飛煙滅。作為補償，這一時期的工作效率是驚人的，是同一時期擁有更多人力資源、更大財力的正規機構無法做到的。正如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生產隊的效率遠遠比不上包產到戶的效率，不同是的，支撐包產到戶的是切身利益，支撐陳一諮之輩的是某種社會責任。

無數次的聚會和挑燈夜談，終於勾畫出發展組最初的藍圖。面對中國農村這樣一個大系統，只可能產生一個龐大的研究計劃。僅僅是初步擬定的研究計劃，有涉及近百年來有關中國農村、農業的數目鉅大的文獻資料要整理，光目錄就可以編成專著；有中央檔案館上千件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共和國涉農的密件，需要加以整理以使解讀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鮮為人知的歷史過程；有關於農村、農業的幾十個子系統並子課題；有急需整理的「包產到戶資料選」；有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對農村、農業的論述整理；有初步的調查計劃、調查方法……，以至於學過機械專業的王小強，試圖用工程設計圖的方式來表述研究的對象和相互關係以及它們的流程。這不經意間證明，用自然科學的某些方法來研究社會問題，是新的趨勢。

陳一諮與一群友人幾個月的忙碌，終於凝聚成一個對中國農村、農業進行研究的龐大計劃。而這個龐大的研究計劃，又僅僅是陳一諮等籌劃的「中國百年振興計劃」的一部分。

當時就明確，這種研究是多學科、多層次的綜合研究；研究的方式以業餘與專業相結合，並在初始階段以業餘為主。對參加農村發展組的人員基本要求是：自願、有獻身精神；有相當學術素養；為人正派、正直。研究經費使用中國社會科學院提供的全國社科重點課題資助經費，其它問題，逐步創造條件解決。1980年10月9日，所有的設想，都由一個相對簡單的合同，即陳一諮代表資助課題《中國農業若

干問題研究》第一階段研究項目的中國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與這個此前絕無先例的「異類」研究組織代表楊勛簽訂的合同來體現。這是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第一個有法律依據的起點。

## 風雲際會

在農村發展組醞釀和初創階段，與陳一諮一起參與建組活動的有：何維凌，時為北京大學青年教師；楊勛，時為北京大學經濟系黨總支書記；鄧英洵，時為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孟繁華，時為《人民日報》記者；王小強，時為中國社科院《未定稿》編輯；翁永曦，時為國家農委工作人員；江北辰，時為北京經濟學院學生；白若冰，時為人民大學資料室工作人員；羅小朋，時為人民大學研究生；張木生，時為內蒙古商校教師；這是其中主要的人，實際上，參與其間的人要多得多。那是一個大時代，它提供了「潮聚」的可能。

經過幾個月的準備，陳一諮等人決定於1981年2月12日召開農村發展組的正式成立會。會議在北京大學專家招待所開，共開了四天。鄧力群、杜潤生分別到會作了真正意義的重要講話。江北辰代表研究組的「臨時領導小組」，介紹了幾個月的工作情況及今後的初步計劃，陳一諮作會議總結。參加會議的人數保持在四、五十人，無非這次會多幾個，下次會少幾個。不少人初次見面，從外地來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貴州來的我；另一個是廣東來的古海燕。其它人都在北京，不是工作，就是上學。但真有機會這樣比較長時間地聚在一起，也是第一次。所有的人都情緒高漲，通宵達旦地議論有關農業、農村發展和改革的問題。會議期間，經過集思廣益，最終將研究組的名稱定為——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這個研究機構成立時，沒有一個專職人員，經常參加活動幾十個人，大約有一半是靠投入業餘時間從事農村發展研究

的各行各業人員，另一半是靠投入課餘時間搞研究的在校大學生、研究生。沒有辦公場所，沒有日常經費。在北大開成立會的費用，也是借來的。農村發展組成立會後，鄧力群促成第一階段的課題經費落實了。這部分經費，主要用於基礎研究，即文獻資料的整理。1981年夏季印發全國的《包產到戶資料選》，就是利用這筆經費收集和編輯的。

沒有專職財務人員，課題經費先由國家農委，後由北京大學財務處代管，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一年多，直到1982年農村發展組有了自己的編制，成為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的建制內的一部分，發展組的經費問題，才最終解決。這是後話了。

還在成立會期間，陳一諮就考慮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下一步的運行了。他讓由貴州來參加會的我整理會議簡報，參加臨時領導小組會並作記錄，這其實是一種考察。成立會結束後，他又安排我及從廣東來的古海燕留下來整理鄧力群、杜潤



王小強（右一）、孫方明（右二）、陳一諮（右三）、劉澤澎（右四）、杜鷹（右五）合影。

生講話錄音，這也是考察。徵得我同意後，他找王耕今、楊勛商量，提出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所有的人都是兼職的、業餘的，需要先有一個「專職」人員，負責聯絡、文書及各種雜務事項。王耕今、楊勛都認為十分必要。當時農村發展組沒有編制，於是決定由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北京大學經濟系共同出公函，向我所在的貴州都勻黃麻紡織廠借調我到北京工作，時間兩年。1980年3月初，我借調到北京，陳一諮將我安排為「科研」秘書，至此，農村發展組有了第一個「專職」人員。同時用課題經費在北大專家招待所租了一間房，作為發展組的辦公室、聯絡室及我的居所。

農村發展組的籌備階段，鄧力群為有利於這個研究組的生存，考慮需要一個有資歷的老同志來關照、指導並直接參與發展組的工作，他選擇了時任社科院農經所的副所長王耕今，為年輕人選了一個「好老頭」。農村發展組成立後，第一任組長是王耕今，副組長是楊勛、陳一諮。不久，王耕今就找陳一諮、楊勛商議，認為他任組長不妥，實際工作主要是陳一諮抓，應由陳一諮任組長，他擔任顧問。楊勛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很快，這事就在組裡宣佈了，由王耕今、楊勛任顧問，陳一諮任組長，王小強、何維凌任副組長。後來何維凌因故離開發展組，副組長只剩王小強。

農村發展組的領導機構，除了組長、副組長，還有一個類似委員會的組織。先後叫「臨時領導小組執行組」、「臨時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組務會議」，先後擔任過這些職務的，除王耕今、陳一諮、楊勛、王小強、何維凌外，還有林春、江北辰、白若冰、張木生、鄧英淘、羅小朋、周其仁、陳錫文以及我等人。發展組籌備階段曾經有公議：認為一個有創新性的研究組織，其領導和管理方式也應創新，要對科層制的科研體制有所突破，待條件具備時，領導小組成員由全體組員選舉產生，領導小組再選舉組長、副組長。可是，直到農村發展組轉型消散，這一點都沒有做到。通常的方式是由陳一諮提

名，經主要骨幹磋商後決定。

1982年夏天，農村發展組建立了黨支部，第一任支部書記是陳一諮，他因工作負擔太重，不久支部書記由高山代理，但時間不長，從1983年初起，支部書記由陳錫文擔任，一直到發展組轉型消散。而黨支部的組織委員，則由杜鷹和趙小冬擔任。這個支部的第一名新黨員，是張木生，其後還有王小強、羅小鵬、鄧英洵、白若冰、謝揚等人以及我。

農村發展組正式成立後，一是基礎資料的整理全面推進，二是在研討的基礎上撰寫了幾篇比較重要的文章，其中有方法論、戰略研究、文明研究以及農村發展綜合研究方面的，也有從理論上論述包產到戶的，這些文章先後發表後，形成一定影響；三是積極準備實地調查。

由於農村發展組的半數成員都是在校大學生、研究生，因而陳一諮等人積極籌劃在暑假期間進行一次較大規模的綜合性調查，地點選在包產到戶得到積極推廣的安徽滁縣地區。這次調查前，於1981年的4、5月份，由陳一諮、孟繁華、白若冰、王小魯以四川為重點作了發展組成立後的第一次外出調查。回來後所寫的調查報告，受到總書記胡耀邦的讚揚。

赴安徽滁縣的調查，事前作了精心準備，調查進行前，組織了多次內部討論。調查的基本計劃先後向鄧力群、杜潤生作了彙報，得到認可。調查於1981年7~8月在安徽滁縣展開，前後參加的有近30人，介紹信由國家農委開的，總經費八千元由國家農委提供（杜潤生簽批的）。到滁縣後，調查工作得到地委書記王鬱昭以及地縣鄉村各級幹部、群眾的全力配合，地委還安排若干幹部，直接參與農村發展組的調查工作。滁縣調查結束後，又組織了幾個小分隊，到別的一些地方作補充和對照調查。

調查人員全部回京後，立即組織各個專題報告的寫作工作，在專題報告和分報告的基礎上，由陳一諮和我執筆，王小強、鄧英洵、白南生、周其仁、張木生等人參與撰寫滁縣調查



的綜合報告。這個報告完成後，先由社科院的內刊《未定稿》全文刊出，幾乎同時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內刊擇要刊出，送中央有關領導參閱，不久又全文由《中國社會科學》公開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看到這個報告後，高度讚賞；趙紫陽總理看了後，作了長篇批示，他指出，這個報告把包產到戶的事說得一清二楚，建議轉發給有關部委及各省領導參閱。趙紫陽還對鄧力群說：滁縣調查報告指出包產到戶是農村改革的必由之路，看來在全國都要這麼辦了，也只能這樣辦。

從1981年開始，到1985年，每年冬季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都特邀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派人參加，其中一些發展組的成員，直接在杜潤生安排下，參與了80年代第一批五個中共中央關於農村改革與發展的「一號文件」起草工作，而這一時期，參與文件起草的發展組成員，有的還不是中共黨員。1983年後，農村發展組的一些成員，也由杜潤生擔任主任的國務院農研中心聘為特約研究員。



一群年輕人，自發組織起來，用業餘時間研究農村問題，並取得很大成果的事，第一時間由鄧力群通報給鄧小平、陳雲，得到認可。應當還是鄧力群，在這一時期的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又提到農村發展組的事，得到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勛等中央書記處會議參加者的共鳴。經過熱議，領導人均認為，這批青年人太可貴了，時下正好有數不清的問題需要通過認真的調查研究，才能說得「一清二楚」，才能為中央決策提供依據和參考。應當組織幾百位像發展組那樣的年青人去搞調查研究。據鄧力群在這次中央書記處會後不久在中南海會見農村發展組的主要骨幹時傳達：中央書記處作了決議，要組織幾百人的調查隊伍，放在各有關部委，先搞一百人，編制放在社科院。

很快，鄧力群將中央書記處的決定向時任國家計委主任的宋平作了溝通，並與宋平協商，由國家計委下達了給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第一批 50 人編制。這些編制，放在中國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專供農村發展研究組使用。從此，發展組有了獨立的編制，從建制上算農經所的一個研究室，但工作安排卻直接由中央書記處的兩個研究室指導。日常經費、調研經費、後勤支撐等問題都有了極大的改進。不久，發展組就用這些編制進了 20 多名專職人員，少數是調入，多數是接納應屆畢業大學生和研究生。這是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第一次轉制，即由原來的以業餘為主轉變為以專業為主，當然，依舊保持著專業與業餘相結合的傳統特點，只是側重點變了。

由於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調研任務的某些特殊性，組裡的成員到地方搞調查，基本上沒有用過社科院農經所的介紹信，不是國家農委的，就是國務院農研中心的，常常還會是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這中間的複雜關係，讓下去搞調查的人，與地方上陪同的人，永遠說不清；講清了，人家也不理解。不知道這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到底是哪一家廟裡出來的「和尚」。

30年前，幾乎所有國家級的研究機構，都缺辦公用房，缺職工宿舍，尤其像中國社科院這樣的新建機構。農經所一下增加了發展組這批人，沒有辦公室，只能在所部擠出一間房，給發展組值班人員及集中時使用。日常辦公地點及沒有住房的人員，由所裡提供經費，在外邊租房辦公，租房居住。那幾年，發展組先後在北京大學專家招待所、北京軍區炮兵司令部招待所、總政西直門招待所、中聯部前半壁街招待所租房辦公和供研究人員集體居住。不少人都是成了家的，家屬來探親，同屋的人就到別的房間擠一下，或者乾脆在辦公室臨時搭個床。條件確實很艱苦，但似乎沒有人抱怨過。

漸漸的發展組小有名聲，影響力也與年俱進，一些沒有參加發展組的熟人、朋友，戲稱這幫人為「農民黨」。發展組的成員們，除了調查時，普遍嗓門較高，面對媒體，幾乎全體一致地保持低調。《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的記者都聞訊要來採訪，均被婉拒。其實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大家都認為，涉及到觀點、意見、建議、研究成果，無需採訪，在討論會上，在公開刊物和內刊上都亮出來了；而發展組本身，是多種因素組合產生的特殊「個例」，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值得採訪並宣傳報導。很長一段時間，儘管坊間有種種傳聞，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全貌，很少有人知道。

從1981~1983年，給農村發展組辦事、創造生存條件，放大其影響，做得最多的是鄧力群；同一時期給發展組派活最多的則是杜潤生。兩者對發展組的幫助都很大。

中國農村改革確定方向的那幾年，也是發展組最活躍的幾年，除每年參加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參加中央一號文件調研和起草工作外，還參加了若干全國性，地區性的專題研討會。

那段時間，杜潤生很少召集發展組全體成員開會，但發展組部分成員參加杜老主持的各種討論會卻不計其數。小範圍的座談，或在外出考察中，或在辦公室，或在賓館，或在杜老

家中，那也不計其數。鄧力群則除了小範圍在辦公室和家裡聽彙報外，幾次在中南海約見農村發展組的幾乎全部主要成員，每次時間都在兩小時以上。萬里也兩次召見農村發展組的骨幹成員，聽取彙報。趙紫陽小範圍與發展組的幾位代表座談過，他外出調查時，也先後多次帶發展組的王小強、陳一諮、周其仁、陳錫文隨行。1984年胡啟立到西藏，專門叫了發展組的王小強、白南風隨行。連不管農村工作的郝建秀（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也專門找了發展組的成員介紹農村改革方面的情況。胡耀邦沒有單獨見過發展組的成員，但讓人傳過話，說這幫年青人幹得很不錯。與國家決策層的溝通，應當理解為是一種互動，一方面使決策層獲得了不少有價值的信息，同時也使研究人員瞭解了決策的重點和難點，這對戰略和應用型研究，無疑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一時間「天時、地利、人和」聚首，加上智慧、責任感和勤奮，造就了這個組，這群人。

## 無選之選

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尤其是它的首都北京，可謂熱鬧非凡，各種思潮湧動，國人所不熟悉的許多新名詞滿天飛。中國向何處去又一次成為理論界、知識界人士關心的熱門話題。對這樣一個大話題，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理解：最尖端的少數人關心的是走什麼道路的問題，只有兩條道路可以選擇，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補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課，似乎二者必居其一，沒有別的路可走。這就涉及到基本政治制度是否要徹底變革的大問題。更多知識階層和民眾，關心的是經濟能否發展，收入能否提高，社會能否不斷進步這類更人性化的問題；而八億農民中的絕大多數，則關心有什麼辦法能吃飽飯這樣涉及生存的現實問題。

概括起來可以說，當時十億中國人中，大約 95% 以上關心經濟，1% 或更少的人真正關心政治，還有百分之一二三的人關心別的什麼。

那一歷史時點，十年文革已經結束三年多了，中國經歷了「按既定方針辦」，真理標準大討論，理論務虛會，十一屆三中全會，西單「民主牆」和民刊浪潮，以及欲速不達的二年「洋躍進」。可以說，這一時期，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進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這些探索，或成功，或失敗，或發展，或消散，都是我們偉大民族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歷史拒絕遺忘它們。現實的選擇與思想的邊界，常常不是一回事。在眾說紛紜之際，中國掌握政權並最具組織力的政治組織——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人物鄧小平出來說話了，用決斷的語言，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只能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所有持不同意見的人，迅速被邊緣化，離開了時代的主流。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其實最主要的是兩條，一條是堅持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一條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比較一下，後一條似乎更重要。經過大躍進、公社化、以階級鬥爭為綱、十年文革、二年「洋躍進」的多數中國人，當時最需要什麼，是社會穩定，是經濟發展，是生活逐步走向富裕。而「四項基本原則」的最主要含義，就是社會穩定，哪怕僅僅是較長一段時期的社會穩定。變革是人心所向，沒有變革就不會有發展，鄧小平代表統治集團宣佈了，中國的變革，只能在這樣既定的社會條件下進行。這一選擇，實際上是無選之選，其它的無數想法、設想，中間不乏閃光的思想火花和美好的夢，可都支離破碎，不具現實性和可行性。哲人說過，任何一種成型的社會形態，當它的內在能量沒有充分湧現出來前，它是不會消亡的。

中華民族，是一個慣於革命的民族，一次次推倒重來，重來的都基本依然故我。猶如金觀濤描述的「超穩定結構」。這一次，終於在既定的政治社會條件下，用「改革」這種方式追求新東西，追求發展，追求進步。中國的政治家以至民眾，

很少考慮大的社會變革的社會成本，鄧小平在給出改革的前提條件時，不一定有對變革成本的精確計算，他大概是從他很懂的東西中，本能作出的結論。這個結論的背後，是這個民族當時唯一的選擇。我很清楚，無數人會不同意這句話。很少有人想過，理想主義也可能成為政治專治的思想基礎。年輕的時候，我們都天真的認為，理想主義多好啊！人沒有理想，還是人嗎？老了才知道，理想如果是個人行為，確有美好的一面，最不濟時，也頂多「走火入魔」，累及自己及家人，如果變為國家行為，與強制力和有組織的暴力相匹配那就可怕了。人生苦短，每一代人都希望迅速達到理想的「彼岸」。實際上，誰能測算出，「此岸」到「彼岸」要走多遠？「彼岸」可能窮盡嗎？因而，理想最好是個人行為，千萬別變成社會團體的「主義」，更不要強加於人。特別是把少數人對社會的「美好」設計，強加給全社會，違者即反動，輕則實行引導、教導、領導，重則予以專政。中國人經歷過嗎？經歷得太多了。這一次，中國人終於有機會，不依賴於任何理想主義的設計和模式，用較低社會成本的改革，一步一步，或快或慢，去謀求發展、謀求進步。

中國人精通「變通」之術，過去大多用於小計，這一次終於把「變通」用在大計上，發揮得淋漓盡致。社會主義要搞市場經濟，給社會主義加個「初級階段」就是了。終於，30年過去了，現在年齡四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今昔對比，都大有「走錯了房間」的感覺，只是縱向比較，滿意度較高；橫向比較，心理落差就大了。不管中國人又面臨多少新問題、老問題，有一個基本事實是：30年，中華民族實現了空前的躍遷，發展比停滯好，進步比落後好，吃飽比挨餓好！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是什麼狀況，現在許多人都難以想像了。當關起門來搞了幾十年「階級鬥爭」的中國人第一次睜眼看外部世界，在同一時期的發展與進步時，吃驚程度現在的人也難以想像了。1980年，有人對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學生做過問卷調查，一道問題是，你以為十年後你的工資

有可能達到一百元嗎？幾乎所有的回答都是，想，不可能！當時大學生畢業後參加工作試用期月工資不到50元，一年轉正後工資約為55元；這一工資水平，已經20多年沒有任何變化了。另一道問題是，你認為你十年後會用上彩色電視機嗎？絕大多數回答是——不可能！就是這樣一個中國，絕大多數人的訴求是什麼？當然不是少數人的理想主義。

許許多多的人在總結中國改革開放30年歷史時，都得出一個結論：經濟體制改革較成功，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這似乎已經成了一個常識。我認為，如果僅僅從國家政治體制的「硬件」上看，大體如此，但觀察政治體制要素之一的「軟件」，結論就會不一樣。30年改革開放所以能成功，能持續，政治改革先行是基本條件。其一，用當時唯一可行的「特殊方式」斷然終止「十年文革」；其二，確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執政黨的思想路線；其三，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其四，宣佈黨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要建立「法治國家」，執政黨、政府要「依法治國」；其五、撥亂反正，平反了大批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形成的「冤假錯案」，給幾乎全部「地、富、反、右」份子「摘帽」，使所有這些人大體恢復了「公民」的正常身份。沒有這幾條，就沒有經濟體制改革的大環境。這是30年改革最重要的政治基礎，其它的都是相對次要的「技術問題」。所以，經濟改革的前提條件依然是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作為前導。籠統地說政治改革嚴重滯後，至少有片面性。一個成熟的民族，不可能時時為了賞心悅目去追求社會進步的「突變」，要習慣於長期持續性的努力，通過「漸變」的積累，走向新的文明。

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造就了太多的鉅變和成果，單是十幾億人搞飯吃，還吃不飽，吃不好局面的深刻變化，就改寫了困擾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同時，也留下了太多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太多的反思。試舉一例：農村實行「包產到戶」那個

階段，先不說有沒有現實可能實行農地歸農民所有，即現在一些人所主張的農地私有化。本來，民主革命最大的成果之一即是「耕者有其田」，經過「土地改革」，已經把全國範圍內的耕地分給了農民，土地的私有性質不變，只是相對均等化了。政府發了土地證，土地私有完成了新一輪的「確權」。不久就搞「合作化」，進而是「人民公社化」，不管是不是真的自願，土地一下子成了集體財產。人民公社制度解體後，把土地還給農民所有也似乎是情理中的事。但在實行包產到戶那一陣子，這條路基本是走不通的，一定想走，也許連「包產到戶」都搞不成。因為「包產到戶」在起步時，是在基本不變動人民公社體制下的農地經營方式的變動。待到幾年後人民公社這面「紅旗」倒下，「包產到戶」定名為「家庭聯產承包制」逐步定型了。當時看來，土地是公有還是私有似乎不那麼重要了，反正土地使用權長期歸農民了。

回頭來看，當時的選擇產生了許多後果：其一，近30年來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急速進展，廉價的土地成本、廉價的勞動力成本，是重要的基礎動因，如果「包產到戶」實行了土地歸農戶所有，工業化會不會這麼快，各級地方政府有沒有可能有這麼多錢搞基礎設施，進行城市的快速擴張。影響因素到底有多大，值得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去研究。其二，中國這樣土地資源人均十分稀缺的國家，在土地私有條件下，可不可能縣市的馬路都那麼寬，大規模的基礎設施那麼方便展開，工廠也敢搞園林化，高速公路也敢建寬寬的綠化帶，絲毫看不出中國是土地，尤其耕地資源極度稀缺的國家。其三，幾億「農民工」進城就業後，土地的臍帶剪不斷，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級差地租增長，他們基本享受不到，相反進城的門檻更高了，每年只能長途大搬遷，農村的房住不上，城市的房買不起，現存的土地制度，成了「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約束因素。

一種在當時幾乎是別無選擇的制度，結果產生了很多後續性的問題，也許有利也有弊。仔細想一下，現存的土地制度，

給政府拿地提供了多大的便利！再推論一下，對不屬於自己的資產都可以這樣安排，那對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資源」、「公共財產」安排之無約束就可想而知了。當時只能那麼做，今後應當怎麼做，是該想想了。這一段是題外話。

農村改革之初，並沒有對「三面紅旗」之一的人民公社體制進行大的改革，就在這樣的框架下，誰能料想，看似簡單，土得掉渣的包產到戶，幾年以後，就從根本上顛覆了人民公社制度。這可是當年彭德懷連批評一下都不可以的「三面紅旗」之一啊。由此給人一點啟示，看似堅固的大廈，時間不到，片瓦不能動，時間一到，頃刻之間倒得沒商量，倒得沒感覺。

講了這麼多，好像與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沒什麼相干，實際上非常相干，只是一些事直接，一些事間接。農村發展組的早期成員，幾乎無例外都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他們中的多數同共和國一起成長，經歷著共和國的經歷，他們中的許多人經歷了「十年文革」，有「上山下鄉」和進農場的經歷。他們關注中國向何處去這樣的問題，關注中國發生的每一點變化，關注甚至參與當年各種思潮的湧動及碰撞。這樣一群人，不會因為別的什麼人鼓動一下，就去幹什麼或者不幹什麼。很顯然，這些人參加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是一個自主選擇的過程。

## 選擇的排它性和局限性

在重大歷史關頭，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大民族，最終作出的選擇，是各種社會力量碰撞、交融、較量的結果。能量最大的、較成熟的社會力量決定選擇的方向，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如果不反對就意味著服從於這一選擇。而選擇對千千萬萬子系統差異性目標的包容性越大，選擇決定的歷史進程將越持久。選擇一旦確定，就具有排他性和不可逆性。其它社會力量再選擇的可能空間會受到擠壓，不確定性轉變為確定性。只有當新的



歷史關頭出現時，選擇的可能性空間和選擇的不確定性才會再次展現，那是上一次大選擇之後很久遠的事了。

國家、民族所作出的選擇，對同一時期有可能作出選擇的個人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力，但個人的選擇依然有一定的空間和不確定性，因而，同一歷史時期個人的人生經歷總是有差別的。個人的選擇，尤其是持續性的長期選擇，除了「大趨勢」的影響力，更多受到個人偏好、知識結構、以往經歷、生存狀態、社會關係及自我追求目標的影響。一旦作出選擇，同樣具有排他性及不可逆性。實際上任何一種選擇都是有局限性的，這種局限性表現在，越是重大的選擇，排他性越強，不可逆性越強。它壓縮、壓制理想的空間。

從農村發展組的整個全程可看出選擇的局限性、排他性和不可逆性。早期參加活動的可能超過二百人，但是慢慢的就有些人離去了。一開始對中國農村的研究，大家都熱心和有熱情，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人就發生了變化。一開始完全是業餘形態的時候，三天一小聚，一個月一大聚。小聚的時候大家無非就是花半天時間碰下意見，交流一下。大聚的時候就是選一些目標比較明確的東西來醞釀，判定哪些問題最重要，農村發展應該包含哪些問題等等，投入的時間也是有限的。所以剛開始時，相當多的人是比較關心這些事的，覺得對這個事情有興趣。但是對這件事是不是值得投入畢生的精力，誰都沒有考慮這個問題。隨著討論的深入，具體研究的展開，就要付出很多精力和時間。選擇就開始確定了，有些人覺得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便選擇了減少或不再參加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活動。比如像最早參與活動的李銀河、林春、左芳，她們後來就慢慢的選擇偏向她們自己的專業了，然後她們就出國了，離開了這個組合。李零參加的時間比較長，早到中期都參與發展組的很多活動，但是最終他也沒有選擇留下來。他先是出國，最終成為北大的教授，寫了大量的著述，很有名，更多地偏好於自己的專業。他是學考古的，搞歷史的。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一些比較重

要的考古，他都參加了。他是發展組的一個熱心成員，但直接跟發展組去搞調查的次數較少，最終選擇搞自己的專業，同樣大有成就。有一點很有意思，凡是參加發展組 1981 年暑期滁縣調查的人，多數都最終在發展組堅持下來了。而沒有參與這次調查的，許多人慢慢的就脫離了發展組。

其實當時每個人都有多樣性的考慮，但是最終有些人，他的興趣、他的專業、他的愛好就越來越集中於這些事情上。不少事情開始的時候只需要熱情，但是如果持之以恆，就需要大量的付出，長期的付出。一旦要做這種選擇，而它不是強制的，完全是自願的，有些人或者慢慢地，或者依依不捨地，或者果斷地離開了農村發展組。但是他們在自己的專業和事業上也就逐步成長起來，十年、20 年過去，其中不少人都成了著名的學者、專家、教授。

像滁縣調查，是利用假期去調查的，時間又比較長，前後是一個多月的調查，回來還要寫報告。從時間來講，平均每個人起碼要花兩到三個月。很多人沒有這麼多時間來做這類事情，像孟繁華，他現在也是很有名的專家，很早就參與了發展組的活動，也參與了一些調查，但是慢慢的就淡出了。他當時是《人民日報》的記者，他有自己的工作，他也可以放棄《人民日報》的工作調到發展組來，如果他當時做了這種選擇，他就會比較長期的繼續參加發展組的工作。但他沒有這樣選擇，只是利用業餘時間來參與一些活動。在那個年代，有事業專攻方向的人，「業餘時間」總是越來越少。而發展組正式成立以後，它的活動卻越來越多。這樣，像孟繁華這樣學有專攻的人，就選擇了把精力主要放在自己更熟悉的領域去發展。

又如陸學藝，他和發展組的交往是比較多的。他與王小強一起做過調查，而且還合作寫了大報告。他關心農村發展問題，但他有自己的專業，社會學方面的專業，也有自己的研究目標和研究平臺。在發展組活躍的那幾年，陸學藝同發展組一直有交往，有合作。他就沒有必要到發展組來，來了對社會反而有損失，來了個人選擇的局限性就會明顯化。「業餘和專業

相結合，以業餘為主」，轉變為「業餘和專業相結合，以專業為主」之後，很多人逐漸就脫離了發展組。這個時候有一個選擇定型化的問題了。人們在做選擇的時候就要考慮：我是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對農村的研究上，還是投入我自己更喜歡的專業。這種選擇的遊移，特別對在其它方面已經有一定積澱的人更明顯。

發展組到中期以後，經常參與活動的大體上就是 40~50 人，真正常年在裡面工作的只有 20~30 人，這就是許多人有意無意地考慮了確定性選擇的排它性及局限性後出現的結果。

比如陳錫文、杜鷹等人，一旦做了這種選擇就變成了終生的職業，特別像陳錫文。杜鷹雖然還在國家發改委分管農業經濟這一塊，但是畢竟他還有其它的工作需要去協調，而陳錫文在做了參加農村發展組的選擇以後，一輩子都在做這方面的事情。趙陽、陳建波、劉守英等人，不是發展組成員，但是因為有了發展組才有了後面的農村發展所，有了發展所之後他們才進來，也變成一輩子搞農村政策研究的人。這就是前面一些人的選擇，對後面一些人產生的影響。剛開始對農村發展和改革問題感興趣的人比較多，但是最終選擇作為一輩子的職業之後，參與的人數就相對減少了。剩下的這些人就日益專注、集中精力，全力以赴的研究農村發展問題、農村改革問題。大體上從 1981 年初發展組正式成立到 1986 年的 4 月份，前三年表現為人員的「聚合」，後三年表現為人員的「離散」，直到最後剩下的一批人轉為農村發展所的人員。人數相對減少了，變成一種持續性的、很專業的研究了。

往往還沒有決定選擇的時候，你覺得有多種可能性，好像可以同時做多種事情，一旦選擇越來越具體，就會感到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這個時候就會考慮，第一，我原來的知識結構是否適合做這件事；第二，我準備做的事情是不是我最感興趣的事；第三，我是不是還有更容易出成果的事情可做。選擇的排它性出現了，這個時候很多人就逐步選擇了退出。

選擇的時候，個人經歷會起很大作用。這一代人的大體



杜潤生到農村調查，王岐山（左一）、王小強（左二）陪同。

經歷是相似的，很多人到過農村，這就成為一個主要元素。參加發展組的多數人，大多是從共和國成立之後上小學、中學、上山下鄉、再上大學等大體雷同的經歷。個人的具體經歷又不相同，個人經歷、偏好、興趣、是否成家等因素在這裡都對其做出選擇有很大的影

響。還有就是交往方式是不是能接受。在發展組成立一段時間後，王岐山又組織一批人成立了農村流通組。所有這些人對農村改革都是關心的、對農村發展也是關心的，但是對發展組的整個運行機制就可能有不同看法。可見目標大體一致的人，也會在具體形式上有不同的選擇。流通組的一些骨幹成員如張少傑、刁新申等後來都進入了體改所。兩個組當時也經常在一起開會，甚至聯合做調查，但是兩個組在組合方式上有差異。後來發展組的活動是以專業的20多人和聯繫比較緊密的人參與，大概也就40~50人，不像一開始時一度達到二百來人。

允許有多種選擇，本身是時代的進步。但一旦作了選擇，會進入某種「被組織狀態」，要服從該組織的規範（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喪失相當的自由。任何有組織的活動，形式上總是少數人在推動多數人，少數人在安排多數人。如果我們不

講具體的形態，就這種狀況而言，不管是專制體制還是民主體制，都是少數人在安排多數人，只是安排的過程不一樣，糾正決策失誤的機制也不一樣。但是它在實施目標的時候都要用組織形式來推進。這也是選擇的代價。因此，我們在堅守自己選擇的同時，更要尊重其它人別樣的選擇。

有不少人，最終並沒有選擇成為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正式成員」（他們中的很多人被陳一諮定義為「聯絡成員」）。但他們對發展組的形成和成長具有重要影響。如翁永曦，在發展組的早期起過重要的串聯作用；如王岐山，他雖然沒有直接從組織上成為發展組的一員，但他介入了發展組的許多活動，並直接安排課題經費，支持發展組的研究工作；又如朱嘉明、黃江南等人，他們從其它領域為中國的改革與發展獻計獻策，用自己敏銳的思維活動啟締著發展組這批人。

那是一個大時代的交響樂，相互差異顯示著樂章的豐富性，不同的樂手們，更多的是配合和協同。專注地幹好自己的事，關心著其它人的進展，享受著實踐創造的美感。

## 幾個階段

據我自己分析，發展組大體上分成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80年的下半年到1981年的1月份，屬於醞釀成立期，標誌是陳一諮回北京，到農村做調查。調查回來之後找各種人交流，這個時候北京是各種思潮最活躍的時期。他們交流的不光是農村問題，但是農村問題慢慢地就成為比較大的比較集中的主題了。醞釀期大概半年左右時間，這個時期的特點是接觸面很大，各種各樣的人都接觸，參與的人也很多。

第二階段起於成立會，一直到成立會之後的各種活動。這一段是由陳一諮按照他的規劃在組織整個發展組的活動，基本上每一個步驟都跟他有直接關係，這個階段的終點就是陳一諮在上海病倒，診斷為疲勞綜合症。這是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

組的高速運轉期，也是它要的成長期。

成長期表明發展組逐步成形了！用原來大家議定的一種方法來運行，當然這個方式是由陳一諮為主籌劃的，如組織學習、專題討論和實地調查。而且這些調查和一些調查報告如預計的那樣對高層決策產生了影響。滁縣調查、廣西調查、江西調查等是這個時期的主要研究活動，同一時期參加了幾次中央農村工作會，參與前兩個中央一號文件的調研、討論和起草。編輯了《包產到戶資料選》，整理編輯了大量農村的歷史資料。量很大，最起碼涉及上千萬字的文獻資料，整理出來的成果，也有幾百萬字。

第三個階段，我稱之為「自組織行為期」。這個時期由王小強和何維凌主導發展組的工作，他們不像陳一諮那麼強勢，不是所有事情都由他們來安排。尤其當何維凌因故離開發展組之後，負責日常工作的王小強就更多地依託「組務會議」來商定決策了。陳一諮仍然是組長，養病的他依舊過問發展組的大計，但日常工作畢竟涉及少多了。這一階段農村發展組的運行機制談不上是「民主化」的，卻有「集體決策」的味道。大家以課題組的形式搞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專題研究，成果非常多。時間是1983~1985年，前後持續了三年時間。研究成果有對糧食問題的研究、對土地問題的研究、對雇工問題的研究、對專業戶的研究、對鄉鎮企業的研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對扶貧、西部開發的研究等等。

這一時期還組織了幾項綜合性的重大課題研究：即「分區立體開發的戰略」研究、「農村經濟變革的系列考察」、「國民經濟新成長階段與農村發展」，幾乎動員了全組的人員參與。如分區立體開發的戰略研究，當時是考慮綜合改革的要求，認為單項改革已經不能解決問題了，需要進行綜合性的改革。但是綜合性的改革又不可能一下子就推開，這樣影響很大，因為它有可能失敗。改革本身是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敗的。為了減少改革的風險，需要試點，需要分區推進，所謂

立體就是多層次的綜合概念，包括有經濟、社會、文化、體制（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政權體制等）多方面綜合性的配套改革。

這段時期，除了全組性的綜合課題，有關部門安排的專題調研任務外，研究人員在選題上的自主性加強了，成員參與課題組合的自由度也比較大。方向性的指導原則，這是在發展組成立的早期就確定的。只是後來有些問題深化了，比如鄉鎮企業在 1981 年的時候人們的重視力度就沒有在 1983 年以後的重視力度大。選題的一個總的原則就是根據實踐的需要，倡導大家去做最鮮活的、或者最有創造性的、最感興趣的、或者已經有一定的理論準備的、或者提前做了一些功課的。課題申報後，由當時的領導小組或組務會議商議之後就確定了。

有的研究甚至是隨機的動議，如貴州的調查就是我向領導小組建議，1984 年的春天就安排了十幾個人到貴州做調查。在整個調查過程中呆得最長的是高山，他在貴州呆了兩個多月，王小強、陳錫文、白南風、謝揚和我都參加了這次調查。

這一時期跟陳一諮指揮的時期有點不同，就是集中起來搞大調查減少了，而在專題研究方面深化了。糧食問題從提出方案，到進行試點，一直到取消統購統銷體制，始終站在改革的前列；「農村改革的系統考察」以及「國民經濟新成長階段與農村發展」方面的研究最終都形成了有較大影響的專著。

最後一個階段是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轉型消散期，大體從 1985 年開始，持續到 1986 年 4 月 9 日。先是杜岩、白若冰、張木生創辦《百業信息報》，帶走了幾個人；其後是陳一諮、王小強帶了一批人去籌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最後是陳錫文、杜鷹、鄧英淘、周其仁、羅小朋等「留守」人員轉到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研中心，最終成立其直屬的農村發展所，標誌著農村發展組的「潮散」。至此，參與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這群人，

開始分道而行，去續寫各自不同的人生經歷，離開了本書的寫作範圍，漸行漸遠。

## 歷史可能走新路

中國的改革有許多特點，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事先進行設計。現在看來，凡是對一個社會大系統的成功改造都沒有設計，凡是有設計都搞不好。西方的三權分立、兩院制，這一套都不是哪一個預先設計出的，都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成形的東西。比如說三權分立經過了幾百年，它的整個機制的完善是經過很漫長的時間逐步完成的。凡是提前有設計的只能是兩種情況，一種就是根本辦不成，另一種就是走到反面，比如你開始設計成「高度民主」，有可能到最後變成高度專制。對民主的理解不同，最終便是「咫尺天涯」。

中國 30 年的改革是沒有設計的，有些還不能稱之為目標的東西，因為它需要定量定性，比如我們一開始說的是四個現代化，什麼是現代化。當時並沒有說要達到什麼標準就是現代化，並且這個標準在經濟上、政治上、個人生活質量、個人收入上各是什麼含義並沒有明確的界定。當時只是從大眾的願望角度提出了這麼一個說法，覺得這個狀態比較好，要結束過去的狀況。我講這個的意思是：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很多人想設計中國的未來，最終都沒有成功。

許多事只能發生在毛澤東逝世和粉碎「四人幫」之後。那麼四人幫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粉碎的，其實也就是在民心、黨心對「四人幫」的一些行為方式及他們所提倡的東西已經反感透頂了。後來有些人追溯在粉碎「四人幫」過程中所使用的方式是不是正確的。當時要使用「正常」的方式來粉碎「四人幫」，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這種方式在那個時候就是正常的。如果你按一個完備的法制國家和擁有黨內高度民主的這樣



一個程序來看，它似乎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況。但假定我們本來就有完備的法制和黨內民主，那裡又會產生「文化革命」和「四人幫」呢？有人批評中國人，只要目標是正確的，手段是隨便可以選擇的，就是不擇手段。其實，拿這個觀點來批評中國沒有多大實際意義。因為在那個情況下，要不要結束「四人幫」，要不要結束文化大革命，這肯定是多數人的要求，用哪種方式去結束，在當時中國險峻的政治環境和險峻的歷史傳統條件下，有沒有比這種方式之外更好的方式。可以肯定地說是沒有的。

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最大的問題：即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一個基本點的轉變，後面就可以做出很多選擇。現在可以將其定義為特別重大的一個歷史性的轉變。但是這個時候並沒有任何人對中國的改革進行像樓宇工程一樣的設計。可以想像一下，就當時來講，在北京，包括一些高校都很熱鬧，大家都在做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非常關心中國的未來，許多人提出自己的設計和主張；第二件事就是補充知識，因為封閉了這麼多年，大家都需要補充知識。所以實際上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講，可能對別人是比較舊的東西，但是對中國人卻是全新的東西。這個「新」有兩個含義，一個是把歷史上一些東西發掘出來了，其實老祖宗早就已經研究過這種問題了，中間斷代了幾十年，現在重新把它挖出來，當成一個新的東西。另一個是把外國的知識、觀點介紹進來，其中大部分也是早就有的。

這一類的東西很多，五四時期的那些口號，如德先生、賽先生很早的時候就有的，把它翻出來就覺得很新，很激動人心。像薩特的哲學早就有的，80年代初拿出來我們覺得很新，因為我們這個民族還沒有認知這些東西。在知識階層裡面形成對建國之後中間斷裂的歷史有一種強烈的反思的態度。再一個就是對中國現實的徹底否定態度，認為中國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是，十億人都「出埃及」，怕也不可能。完全推倒重來，誰有這個力量？其實，那一段時候也有很多成果，如提

出廢除思想罪，提出理論研究無禁區等。

值得尋味的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是中國近百年來反復面對的問題。在面對清政府的時候是這些問題，面對北洋政府的還是這些問題，面對蔣政權的時候是這些問題，再後來面對共產黨執政的也還是這些問題。當然，已經有很多東西不一樣了。只要中國的歷史性轉變沒有徹底完成，不管是哪一種探索，對中國來說都是一個有益的探索。歸根結底，在過程完成前，不能只有一種「彼岸」；在過程完成後，新的「彼岸」又在前頭，那依然不會只有一種「彼岸」。1979年，我給羅小朋寫過一封信，現在信的整個內容我記不住了，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說，對中國的各種各樣的探索都是有益的探索，不管它未來怎麼樣，都是我們民族的精神財富。後來才曉得在60年代顧準就已經說過了同樣的意見。他是自己獨立得出的判斷，我也是自己獨立判斷的結論。

中國社會的進步、社會發展的切入點在哪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有不同的選擇。農村發展組這一部分人，當時他們不是不知道有多種多樣的看法，有多種多樣的選擇。但他們知道，「彼岸」可以很多，而現實的路只有一條。他們在作個人選擇時，一些前提是明確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共產黨的領導，這是最核心的一條。這是歷史事實，應該說這些人是認同這一條的。參與發展組的人所做的選擇，第一覺得中國要改革，中國如果不改革，這個國家不可能有發展和進步。第二就是這個改革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第三就是改革要從農村開始。當時中國是十億人口，有八億是農民，其中的三億農民連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第四就是建國之後農村是受害最深的，被剝奪最嚴重的，同時又是現行體制最薄弱的環節。是有可能找到突破口的。像翁永曦、王岐山當時主要在考慮宏觀的問題。他們之所以心甘情願的調到國家農委去工作，無非是認定改革要從農村做起。還有何維凌，長期考慮的也是國家發展和進步問題。他沒有下過鄉，沒有務過農，他在和這些人的交

往過程中瞭解農村，認可了農村改革的重要性。

從現象形態上看，這一代人面對的基本問題，似乎同前幾代人相似，都是中國需要大變革的問題。幸運的是，歷史有可能走新的路，這代人註定要走一條新路。中國的現代化，似乎有兩條路子，一條是中國的現代化，要實現國強民富，必須從改變上層建築開始，如多黨制、三權分立、民主選舉等。另外一條路就是把這個過程看成一個漸進的過程，因為這些雛形都是有的，我們的議會是參加國際議會聯盟的，憲法裡面賦予了它很多功能，將來如果修改憲法還可能賦予它更多的功能，這是個歷史過程。中國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從設計上看參照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在中國的憲法裡都有規定的，只是我們更強化的一個東西是黨的領導。中國在這個階段就是這麼走過來的。歷史地看，一些「虛」的東西，將來有可能「實」起來；一些現在很「實」的東西，可能「虛」起來。包產到戶幾起幾落，曾經很「虛」，後來「實」起來了；人民公社制度，曾經很「實」，現在「虛」得無影無蹤。所有這些，都在考驗中國人的耐心。有哪一代人，真正到過「彼岸」呢？往前走，別回頭就是了。

中國農村的改革不能說是發展組或是杜潤生等某一個人發明出來的，它是一個上下結合的互動過程，農民出於他自身的考慮，自己的自留地種的東西就是比集體的東西長的好。當時對農民來說，首先是要吃飽飯，只認為吃飽飯是最大的幸福，這些東西帶有普遍性。就是這樣一個形式，於是就要有人去把這些東西進行總結，總結之後還要將其變成國家、黨的決策，當決策成熟之後就變成一種法律，然後形成制度。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這麼搞，不搞也不給你扣什麼帽子，說你是「小腳女人」。當時的中國，很多人看不出這個鉅大的變化，會有多大的後續影響。包產到戶從不准、不許到可以，最終在全國普遍推開。這樣大的一次歷史鉅變，沒有殺一個人，出一批英烈，所以，多少人看不出它的深刻和偉大。如果偉大與深刻總要和鮮血並行，我們寧願樸素平凡。

這一代人身上的那種社會責任感和歷史責任感，再加上機遇，碰巧有人來把這些人組合在一起，碰巧這個時代需要這些東西，碰巧這些人和事把大家溝通起來。討論、調查、開會、寫文章，在高度運轉過程中，從最開始到最後消散，就是若干生命體的這樣一個過程。大家當時可能有這樣那樣的不滿意，但是最終還是走過來了。發展組研究活動的一個特點是強調高層次、多學科、綜合性的研究。集合了很多學科的人，如搞自然科學的何維凌和搞文獻資料的北京大學圖書館的那些人，還有學農經的、學政經的、學歷史的、文化的、哲學的、考古的、社會學的等各個學科的人員，基本形式就是以課題組為活動的基本單元。比較明確的分工是到中期以後，一開始沒有。大規模的調查都是有組織的，事先做一些組織策劃、內容選定的工作。它的幾個原則確定了當時的幾個優勢：第一就是自願的，大家有興趣在一起把一種比較好的狀態放在研究上；第二因為它是多學科的，它在方法論上有些優勢；第三因為當時有上下聯繫的直通車，直接可以通到中央最高層。裡面也有個人行為，就是誰對這個問題感興趣就可以專門寫一篇文章，大家來討論認可。但是發表的時候就是著作者的名。三個人搞一個調查報告，如果你不同意你可以不署名，這是自由的。即使是以組的名義，一般情況下都會註明是哪些人來執筆的，哪些人參加寫作的，哪些人參加討論的。它不像當時的一些研究機構，比如說這個課題有五個人，最後只列一個人的名字，其它人就只能給他當助手。這是發展組裡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它強調調整體組合的力量，同時尊重個人的「知識產權」。

農村發展組存在的幾年，使用的研究經費主要是全國社科重點課題資助經費。當時沒有科研津貼，會議費也很少，那個時候很少會說去哪個咖啡廳討論問題，都是去誰的家或者是找個免費的場所討論問題，大家喝點白開水，連茶都沒有。談完之後要吃飯，就七拼八湊了。後來發表的東西漸漸多了，有了稿費（很低），組裡不成文的規矩是，凡用組的名義發表的稿費就用來當活動基金、會餐費。安徽滁縣調查的綜合報告在

所体现的经济原则

包产到户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

关于农业发展形势问题研究组 王小强 周其仁

怎样认识包产到户，是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国

位  
当  
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没有一件事能象包产到户那样紧紧扣住八亿农民的心弦，没有一件事能象包产到户那样得到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深切关注，包产到户，并不是一件“新生事物”。早在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社时期，浙江衢州地区的人们就用它组织过生产，以后却当成古旧的产物混灭了。三年困难时期，被安徽农民奉为“救命田”的责任田，拯救了千百万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劳动群众，后来又被称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毒批判了。多少人为它，增产增收，欢欣鼓舞；多少人为它，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指引下，包产到户安徽的包产到户，又一次作为亿万人民群众的历史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并在探索和实践中，收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奇迹般的效果。今天，不管人们关于它的争论如何还继续，毁誉参差、莫衷一是，展旗展起的包产到户，已经在党的支持和领导下，作为亿万农民的情志实践摆在我们面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历史的实际运动，已向我们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包产到户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它是否能够增产这一狭隘的界限。事实上，不管它是不是权宜之计，实行包产到户以后，我们已经不当也不可能再回到小队核算、大队核算、公社核算这样一条“穷过渡”的老路上去了；不管它是否曾带来本上而看对土号，农村经济运动的发展，都将以包产到户为起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走出一条为我们所不熟悉的道路来。包产到户的性质及其前景，关系着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前途，面对这样一个历史实际，我们必须对一系列极其严肃的理论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就包产到户与其他形式的责任制之间的优劣程度的比较来认识包产到户，也不能仅仅就包产到户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之间的优劣程度来认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论包产到户，而必须牢牢地抓住它内部的一般本质特征，把它放到人类生产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从经济运动一般规律的高度，加以历史地考察和分析。

这一次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对于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的人们，往往从个体生产同集体生产的绝对对立、集体生产总是优越于个体生产的观念出发，认为包产到户是一次迫不得已的倒退，所以，即便它能够救急治穷，也是共产主义者所不能提倡的。这种观点甚至连一些赞成包产到户的人们，有时也不得不承认。因此，要说明包产到户的性质和意义，首先必须以对集体生产、集体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为前提。

应当明确指出：共同劳动、集体经济并非从来就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标志。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顺序上，它首先是落后的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严格地说，人们通常所说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应当是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性质而言，并不等于说在自然经济形态中，每一个生产者家庭的生活，都富足到可以万事不求人的程度；相反，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在贫穷困苦的不发达，以及一些必需的生产资料的匮乏，人类尚不能最终脱离原始共同体的脐带。就是在原始社会的社会生产，往往也是由一定范围内的互助合作来维持的。很明显，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体家庭内部男耕女织式的分工，充其量只能满足一些起码的生活需要，即便只是满足简单再生产最低限度的物质要求。人类也必须求助于家庭分工以外的其他来源。季节性很强、突击性生产项目较多的农业生产，更使农民之间的互相帮助成为维持生产之必须。马克思在论及同资本主义协作制度完全不同的古代协作时指出：在古代以及一直延续到近代的农村公社中，“我们所看到的条件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原始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象单个蜜蜂离不开蜂巢”。

注：(1)见《浙江日报》1967年1月27日李锐的文章

注：

经济管理、联系于多种形式的经济关系、化心集、气源、导气的经济、不任制者其里着、又指区别的、输入经济效、与互有结合、的、经济关、口劳动的、生产、包产到户、为表、与形式、(子)国、体、利益、况、前、若、置、心、理、包、产、到、户、所、体现、的、经济、原则、经济、发展、前、途

马克思指出：“生产还是以单纯的体力劳动，以使用肌肉力量为主要的简单劳动，还是以人的国际理性和协作劳动为基础，生产的增长是依赖于单纯的还是依赖于复杂的劳动。”

《中國社會科學》發表後，領了一筆比較可觀的稿費（二百多元），全組到「致美樓」大吃了一頓。當時真能吃，菜一個一個上，供不應求，後來像溜肥腸、紅燒肉就兩份一起上，才勉強供求平衡。一次何維凌從口外弄來一頭羊，請大家到家裡吃涮羊肉，風捲殘雲，一頭羊的肉吃光了，鄧英淘、白南風意猶未盡，用刀剔羊骨頭，一丁點肉都不放過。這群人就這樣，緊張地工作著，快樂地生活著，嘔心瀝膽，為農民計、為民族計，這大概就是陳一諮一再說的「獻身精神」吧。

##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成立會上，鄧力群希望發展組的成員，要腳踏實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這一席話，足見鄧力群對這批人的優點、不足、追求是瞭然於胸的。

實踐是大課堂，在變革時期，實踐創造的豐富形態，尤其讓人追隨不舍。農村發展組的主要研究人員，借助現代交通工具，行程何止萬里。從北京到調查目的地，多乘火車，經常是幾十個小時的硬座；縣與縣，縣與鄉村主要靠汽車；拖拉機、馬車都坐過；不通車的地方，也曾長途跋涉。那幾年，城市是過往點，鄉村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吃住在農民家，是很經常的事。用楊勛的話來說，似乎又回到了「革命年代」。

整個這幾年的另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學習空氣非常濃，這批人經歷著共和國的經歷，但是每個個人的知識結構卻有很大的差異。綜合研究需要一個共同的語言系統。如果用不同的理論標準來研究同一個系統，比如對一個地區進行綜合研究，社會學用社會學的系統，比較經濟學用比較經濟學的系統，各用各的語言系統，中間沒有一些大家都認可的語言系統的話，那麼在研究上就會產生衝突和問題，知識間的互補性就會受到傷害

和削弱。一涉及具體的研究對象，發展組的每一個人，不問過去的經歷和學歷，都深感知識要填補，知識結構要調整，需要有共同的評價標準和語言系統。現在有些人稱之為「惡補」，那個時候沒有用這個詞語。

學習的形式主要有四種，一是讀書會，二是組內授課，三是聽著名學者的課，四是研究過程中的學術討論。

王小強等人組織了一個讀書會，這個活動延續了好幾年，參加的有王小強、王小魯、林春、李銀河、左芳、周其仁、張木生等很多人。它的聚會地點不定、時間不定，當時大家都感覺到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把從國外引進的與國內的一些新的著作都閱讀盡。讀書會活動就是某個人讀了一本好書，他就來講，然後大家討論，如果有興趣事後也可以再去讀這本書，也可能就不看了，只聽別人講，通過這種方式豐富自己的知識。

組內授課比較系統，由發展組內對某一方面有專長的人給大家授課，大體每週一次至兩次。如何維凌就給大家講系統論、講不平衡的理論，包括索羅斯的反身性定理，以及方法論的內容。他與這方面做研究的人接觸得比較多，因為他本身就是學自然科學的，因而在方法論上他就不停的給大家授課。特別是1981、1982年，課上得比較多。鄧英淘給大家上數論，因為他認為數學對搞研究很重要，給大家在基礎性的領域找共同語言。在發展組內講過課的還有陳一諮、白南生、白南風、張木生、羅小朋，當然講課最多的還是何維凌、鄧英淘、白南生。這個活動一直延續到1983年。

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在人大和北大聽一些研究生的課程，包括聽陳振漢講的課，厲以寧講的課，這些學習增長了知識，彌補了知識結構上的缺陷。

學術討論是發展組最經常的活動，大大小小的討論不計其數。凡陳一諮參與的討論會，他常常會有長篇發言，也可算是另類的講課。傳授了不少心得、體會、知識。組內的討論有

熔爐式的氣氛，參與的每個人都受益匪淺，正是通過這類「公共活動」，發展組在 1983~1985 年時期，搞一些綜合性的課題，在溝通方面就很方便。所用的語言大家很容易就能懂，這對利用多學科的力量，對同一個對象進行研究，起到了非常大的兼容作用。

知行合一，是這一時期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最大特點，最大樂趣，最高追求。